

历史

苏联“科里亚金事件”及其国际影响

陈娅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苏联精神科医生阿纳托利·科里亚金因揭露苏联政府以“精神病”治疗方式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而被逮捕审判。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科里亚金得以释放，随后移民瑞士。苏联解体后，科里亚金回到俄罗斯，定居雅罗斯拉夫尔州。“科里亚金事件”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科里亚金 苏联 精神病学 持不同政见者

【中图分类号】K51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2)06-0058-0006

1981年4月11日出版的第377期医学杂志《柳叶刀》^①发表了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哈尔科夫市精神病医院医生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科里亚金的文章《被强迫的病人》(Unwilling Patients)，披露了苏联政府将精神正常的持不同政见者诊断为精神病患者并长期监禁于精神病医院的事实。然而实际上，早在当年的2月13日，苏联克格勃就逮捕了科里亚金，并于6月3日对其进行刑事审判。科里亚金及其文章的命运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英国学者彼得·雷德韦、悉尼·布洛赫认为，《柳叶刀》发表此文完全是一个特例，在医学专业杂志中出现“医学政治”文章，暗示着科里亚金医生在临床医学上的可靠性，这也暗示着英国医学组织对科里亚金医生的尊重^②。

由于相关俄文资料极少，笔者在此只对英美医学及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关于科里亚金事件的

文章及科里亚金本人的信件及其所发表文章加以介绍。

一、事件背景及起因

科里亚金1938年9月9日出生于西伯利亚的偏远小城坎斯克(Kansk)。1956年科里亚金考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医学院。在科里亚金即将完成学业时，旨在协助苏联监狱与劳动集中营的“维护公共秩序部”(The Ministr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Public Order)曾经试图招募他，然而遭到科里

^① 《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是世界医学界权威学术刊物之一，也是影响力最高的SCI刊物之一，其在医学界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该杂志于1823年10月25日创刊，从创立至今始终保持独立，未曾加入任何一个医学或科学组织，至今其在全世界医学界的发言仍保持着独立性和权威性。

^② Peter Reddaway, Sidney Bloch. Soviet Psychiatric Abuse, New York: West view Press, 1985, p.151.

【作者简介】陈娅，山东省菏泽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亚金的拒绝。导师要求科里亚金就此做出解释，因为这份工作条件优越，薪酬颇高，并且还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医学专家。然而科里亚金表示：自己不想在集中营系统工作。科里亚金说，让愿意去的人去吧，自己不是其中一员^①。

1963年大学毕业后，科里亚金被分配到中亚城市阿巴罕西南150千米之外的小城。在科里亚金之前，该城尚没有精神科医生。科里亚金在那里初露锋芒，他忠于医生的职业道德，未经允许，私自拆掉了精神科病室为防止病人逃走而设置的栅栏以及监狱式的大门。他认为将精神病人关押在这样的病室中有违人道主义精神。

4年后，科里亚金离开阿巴罕，来到哈尔科夫市精神学与精神病学研究中心，攻读副博士学位。科里亚金想潜心于纯粹的研究，然而，他发现那里条件极为糟糕，薪酬低，房屋简陋，研究方法也极为保守，缺乏进行科研工作的必要条件。科里亚金声称，在这里“科研人员探索毫无意义的事实，追逐名望”^②。

1972年，副博士毕业后科里亚金来到克孜勒^③，成为当地精神病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克孜勒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偏僻小城，很容易让人沉醉其中，忘却文明世界的纷扰。此时的科里亚金内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从一个满怀希望的精神科学学生变成了不妥协的现实主义者^④。

科里亚金曾表示：“我接触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各阶层的代表，我的视野也因之变得开阔。”他以一种嘲讽的语气回忆：“我开始更深入地了解官僚阶层与作为寄生阶层的权贵人物，他们与人民利益渐行渐远。一切标语、招贴画、广播访谈与电视节目都是愚弄大众的方式。我尽自己所能与愚蠢的秩序和毫无意义的法律做斗争……我不行贿、送礼，从不与之之为伍，我不会阿谀奉承，从不参加他们的党派……这便是一种抗议。”^⑤

1978年，科里亚金回到哈尔科夫并就职于哈尔科夫精神科诊所，他下决心要遵从内心日益增强的意志。然而仅仅照顾在其诊所就医的病人是远远不够的。科里亚金表示：“我立下坚定的信念，即一个人必须与卑鄙勾当做斗争，公开反对一切被粉饰为‘科学社会主义’福祉的非法行为。”^⑥

1979年，科里亚金成为地下组织“调查‘以

政治目的滥用精神病学’工作委员会”^⑦（以下简称“工作委员会”）精神科顾问。该组织主要是检查那些由于挑战政府权威而被监禁在“精神病—监狱”（psycho-prison）中的苏联公民，他们在这里或接受治疗，或受到惩罚。一位曾经为“工作委员会”服务的精神科医生总结说，没有任何医学根据证明，这些持不同政见者需要受到隔离。科里亚金检查了16个病人，并发现他们都是受害者。科里亚金的报告被秘密送至诸如国际特赦组织^⑧之类的西方组织。由英国医生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关于囚禁持不同政见者于精神病医院的工作小组”（Working Group on the Internment of Dissidents in Mental Hospital）公布了这些案例。

二、科里亚金事件的发展（1981年2月13日至6月5日）

苏联政府对科里亚金的行为并没有置之不理。克格勃两次潜入科里亚金的住所搜查。1981年2月13日，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深入考察，科里亚金欲乘火车前往莫斯科，然而他中途就遭到逮捕并被押回哈尔科夫。有关部门指控科里亚金触犯了刑法第62章第1条“散播反苏宣传”罪。此外，科里亚金还遭遇“私藏枪支”的指控。经过四天的审讯，科里亚金彻底崩溃，此后他被强

① Kevin Klose, *Russia and Russians in the Close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84, p.99.

② Ibid, p.101.

③ 克孜勒是图瓦自治共和国首府。位于大小叶尼塞河汇合处，南部与蒙古接壤，主要居民为布里亚特族。

④ Kevin Klose, *Russia and Russians in the Closed Society*, p.103.

⑤ Ibid.

⑥ Ibid.

⑦ “调查‘以政治目的滥用精神病学’工作委员会”（The Working Commiss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buse of Psychiatry for Political Purpose）成立于1976年，创始人是亚历山大·普德拉比内克，他至今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该工作委员会隶属于莫斯科赫尔辛基人权小组，在工作委员会存在的四年间，公布了1500多页文件资料——这些资料准确地反映了其主要活动。该委员会的目标及任务为：将那些通过非法途径被强制关押在精神病医院的案例公之于众，并且帮助被关押人员尽快获取自由；给予那些被不公正地关进精神病医院的人及其家属以帮助；促进精神病医院环境的人性化。另外，由于此前中国国内从未有关于该现象的研究，笔者将“the Abuse of Psychiatry”译为“滥用精神病学”，特指苏联将持不同政见者诊断为精神病患者并监禁在精神病医院，以对待精神病患者的方式来对待精神正常的持不同政见者，以此来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⑧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是一个人权监察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主要由全世界的社会学教授组成，监察国际上违反人权的事件。国际特赦组织是全球最大的人权组织，197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行带至哈尔科夫监狱。据科里亚金回忆，他签署了一份证词，并宣读针对其本人的法律起诉书。此后，尽管有关方面以科里亚金家人及其人身自由相要挟，但他并没有做进一步妥协。

1981年6月3日，哈尔科夫地区法庭开庭对科里亚金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庭审。哈尔科夫名义上向外国人开放，但由于外交部宣称的“暂时原因”，这座城市将西方记者拒之门外。尽管如此，西方还是发布了对科里亚金的庭审记录。在庭审中，法官公布了对科里亚金的一些犯罪指控：控诉科里亚金撰写污蔑诽谤苏联政府及苏联共产党的文章；写作污蔑、诽谤斯大林时期苏联及共产党历史的文章；编造诽谤苏联民主与管理的文章；与他人的通信中含有反苏内容……

此外，苏联政府还宣称，科里亚金在其创作的诗歌中写到“在这个混乱世界……”触犯了苏联法律；他在家中私藏“外国杂志”，与一名居住在西方的亲属频繁通信，而据侦查员称，科里亚金的这位亲属曾是白卫军。

当被问及如何为自己辩护时，科里亚金声称：“我并不后悔，由于这只是对我参加‘工作委员会’的惩罚而非公正的审判，我拒绝发表过多言辞。”然而，随后科里亚金改变了想法并谴责庭审结果，他断言自己是由于“担任协助工作委员会的医学顾问”而被捕。他补充说：“这份工作可以确定，精神正常的人被毫无根据送入精神病医院，被强制监禁并接受治疗’，而这与苏联的公开宣传大相径庭。正因为如此，在医学人道主义、个人正义以及公民责任等的指引下，我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感到羞愧，我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①科里亚金在接受审判时发表了演讲：“我沉思良久并分析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并不因此而感到内疚——我没有违背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的操守或职责……对我的调查和审判并不代表公正的行为，而这只不过是對我思想的镇压，我知道服刑必定是一件艰苦的事。在法庭上我不会乞求什么，不必置喙强加在我身上的刑罚，我永远不会接受我们国家的制度，在这里，精神正常的人由于自主的思想被关押于精神病医院。我明白数年的身体监禁、羞辱与嘲笑在等待着我。我完全了解这些，我亦明白我的家庭将面临艰难的生活：物质匮乏，

或许还会有政府的直接迫害。我只寄希望其他人能拥有自由的生活。”^②

尽管指控是以“科里亚金的文章诽谤国家”为根据，但法官与两位陪审员并没有阅读这些资料或是听取科里亚金与公诉人之间的辩论，也没有试图判定科里亚金在何种程度上散播了其言论。

庭审结束，法官宣读了对科里亚金的审判结果：科里亚金罪名成立，法庭将对其数罪并罚，判处其7年劳动集中营监禁及5年流放。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③这样看待科里亚金所受的刑罚：“科里亚金的被捕为‘工作委员会’人道主义的合法行动画上了句号……并且引起了恐慌，苏联政府正在为实现其政治目的利用精神病学对相关人员进行迫害。”^④

科里亚金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美国精神病学联盟、法国与瑞士的精神病学专家组织提出了正式抗议，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1981年4月9日，加拿大精神病学联合会向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写信为科里亚金辩护。在法国，1981年5月，数个精神病学会组织记者招待会，400余人签署了请愿书支援科里亚金。1981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吸收科里亚金为通讯院士，此后该学会还授予科里亚金年度最高荣誉。科里亚金在国外得到诸多支持。

三、科里亚金的狱中生活（1981年6月5日至1987年2月19日）

审判结束后，科里亚金被遣送至彼尔姆地区的一个秘密集中营。

1981年夏科里亚金在致世界精神病学专家的公开信中，继续抨击苏联“将正常的持不同政见者诊断为精神病患者并监禁在精神病医院”的事

① Kevin Klose, *Russia and Russians in the Closed Society*, p.109.

② Peter Reddaway, Sidney Bloch, *Soviet Psychiatric Abuse*, p.109.

③ 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Moscow Helsinki Group，缩写为MHG），又译为莫斯科赫尔辛基集团，全名为莫斯科赫尔辛基守望小组（Moscow Helsinki Watch Group，俄语为Московская Хельсинкская группа），俄罗斯著名人权团体、非政府组织。建立于1976年，其宗旨在于推动1975年签订的赫尔辛基协定（Helsinki Accords），确保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推行。该小组曾经一度解散，又重组，目前仍然活跃在俄罗斯，现在的领导者是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参见维基百科“莫斯科赫尔辛基人权小组”词条。

④ Peter Reddaway, Sidney Bloch, *Soviet Psychiatric Abuse*, p.109.

实, 并声称这种现象在苏联有扩大化的趋势。科里亚金在信中描述了自己的生活: “在集中营中, 他们不仅拒绝我履行医生职责, 甚至剥夺我阅读精神病学专业书籍的权利, 我所写的每个字都被检查, 信件被没收或延误, 而我与妻子的会面也被禁止。”^①此外, 科里亚金请求全世界的精神病学家审视道德影响并遵循道德规范行为, 号召西方精神病学家“给那些出于一己私利或反人道主义动机而践踏公正理念和医生誓言的人贴上‘耻辱’的标签”。

1982年7月科里亚金被转移到契斯托波(Chistopol)监狱, 这是苏联关押政治犯的主要地方, 条件要比劳动集中营更艰苦。在致世界健康组织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信中, 科里亚金强调: “人类最基本的权利是生存权。作为一个苏联政治犯和医生, 我不得不指出, 犯人在政治集中营所处的环境足以破坏其身体和心理健康。他们不仅遭受饥饿、寒冷、剥夺睡眠权利等折磨, 甚至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②在狱中, 科里亚金经常遭受毒打, 科里亚金的妻子也证实了这一点: 科里亚金在契斯托波监狱遭到狱警殴打, 并由于绝食(他唯一的抗议方式)而营养不良^③。

为何科里亚金医生会受到如此虐待? 答案在于, “科里亚金对他的狱友阿鲁秋扬(M.Arutyunian)所给予的医疗救助。阿鲁秋扬曾遭受狱警的毒打, 同时监狱的医生拒绝给予其进一步的救治”^④。此外, 埃兰·永利^⑤根据来自苏联的报告分析, 苏联政府孤注一掷的尝试是为了促使科里亚金“公开宣布放弃反对立场”^⑥。

1983年, 科里亚金当选为英国皇家精神病医学院院士。同年, 美国科学进步协会授予科里亚金“科学自由与责任奖章”。在科里亚金当选为英国皇家精神病医学院院士的时候, 其提名者以如下语言强调了他的品质: 科里亚金坚持职业操守, 面对严重损害职业道德的行为, 他并没有保持沉默。尽管他知道自己和家庭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⑦。人们为科里亚金当选为院士而欢欣鼓舞, 同时也为其受到的虐待而担忧, 很多精神病学家及人权活动积极分子向苏联政府写信抗议其对科里亚金所施的暴行, 以埃兰·永利为代表的“关于囚禁持不同政见者于精神病医院的工作小

组”呼吁医生及其他人, 代表科里亚金医生向契斯托波监狱以及苏联卫生部门主要领导人写信或发电报抗议。在他们看来, “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强烈呼吁, 科里亚金才能获救”^⑧。

1983年12月30日科里亚金写自监狱的信件表示国外医生的支持对自己帮助很大。美国科学联盟于1984年2月3日公布了这封信, 科里亚金在信中表达了其继续抗争的决心: “我们会因为拒绝与克格勃谈话、绝食抗议、抱怨、工作而受到惩罚, 近两个月我和其他人得到的是低于平常份额的食物, 于是我宣布绝食以示抗议。请以我的名义转告国际社会的同行: 我为健康和生命而斗争, 并且很乐意得到他们的支持。我筋疲力尽, 心脏病发作, 并伴有水肿, 但是我会坚持绝食抗议。”^⑨

1984年10月, 科里亚金已经绝食四个多月, 虽然他想要结束这种反抗行为, 但是在生理上已无法进食。1985年1月末科里亚金再次绝食, 这时他已经无法站立。此时, 英国皇家精神病学院的院士安东尼·克莱尔呼吁大家加入解救科里亚金的行列, 因为他怀疑, 此时苏联政府可能会放任科里亚金绝食至死。“我们感到震惊的是, 在得不到科里亚金公开宣布放弃信仰的妥协的情况下, 苏联政府可能会认为科里亚金的死亡才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近来, 数名苏联政治犯死亡, 如果我们不为科里亚金发出呼吁, 那么这名勇敢的医生的下场可能亦是如此。他被选举为皇家精神病医学院的院士, 即是我们的同事, 我们有责任帮助他。”^⑩同时, 英国皇家精神病医学院与美国科学进步联盟向苏联致电呼吁科里亚金应得到适当的医学救治。

① Peter Reddaway, Sidney Bloch, Soviet Psychiatric Abuse, p.242.

② Carl Gershman, “Psychiatric Abuse in the Soviet Union”. Society 9, July/August 1984, pp.54-59.

③ Wynn Allan, “Anatoly Koryagin”. Lancet, Jan 7, 1984.

④ A Chronicle of Human Rights in the USSR (No.48). New York: Khronika Press, 1983, p.41.

⑤ 埃兰·永利, 关于囚禁持不同政见者于精神病医院的工作小组(Working Group on the Internment of Dissidents in Mental Hospital)主席。

⑥ Peter Reddaway, “Dr Anatoly Koryagin”, The Lancet, Dec 25, 1982.

⑦ Peter Reddaway, Sidney Bloch, Soviet Psychiatric Abuse, p.109.

⑧ Wynn Allan, “Anatoly Koryagin”.

⑨ Carl Gershman, “Psychiatric Abuse in the Soviet Union”. pp.54-59.

⑩ Anthony Clare, Correspondence of Anatoly Koryagin”.

四、科里亚金事件的结束及余波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总书记，改变了以往的一些做法。1987年苏联开始颁布保护精神病患者的法律，改革精神病机构体系，世界精神病学重新接纳苏联^①。同时，英美人权外交把矛头对准了苏联，在里根的第二任期，美国专家多次访问苏联监狱、精神病医院和其他设施，而且在每一次访问之后，都会在美国大做宣传^②。

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苏联于1987年2月2日签署了一项释放法令，51名因“反苏鼓动和宣传”而被关押的犯人得以被释放^③。同时，两名被关押的精神科医生：科里亚金与谢尔盖·霍多日被告知：如果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将获得自由。1987年2月19日，科里亚金被释放。然而科里亚金并没有立即移民，他的儿子仍被关在监狱中。同年，在儿子被释放之后，科里亚金举家移居瑞士。至此，科里亚金事件画上了句号。然而科里亚金的活动却没有就此结束。

尽管在狱中心身备受折磨，但科里亚金的斗争并没有因此停止，出狱后，科里亚金仍直言不讳地批评苏联的精神病学。科里亚金认为苏联政府应该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他的这一举动遭到西方某些精神病学家的批评，“在自己的立场上太过强硬，不懂得妥协”。哈佛大学医学院医生莱斯特·格林斯潘这样评价科里亚金：“我们可以理解他的愤懑，但是我们不能效仿其行为。”^④

1987年10月29日，科里亚金在英国皇家精神病医学院做了题为“苏联精神病学参与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演讲^⑤。1988年在写给英国皇家精神病医学院院长的信中，科里亚金表达了自己对医学院的感激以及继续与苏联现时的精神病学做斗争的决心：“听闻贵学院继续致力于与‘以政治目的滥用精神病学’做斗争，我十分欣慰。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贵学院等组织的努力，我不可能获得自由。我们必须继续为改变苏联而工作，并阻止苏联为搪塞西方而粉饰太平。再一次感谢您及贵学院对我和我在苏联的同事与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期待未来与您的合作。”^⑥

1988年1月23日，在波恩召开的关于“精神病学与公开化”的会议上，科里亚金发表了演

讲。此时正值世界精神病学重新接纳苏联有关组织之时，苏联的一系列做法，如将许多犯人从精神病医院释放，一些病人由特殊精神病医院转移至普通精神病医院^⑦等，使得西方组织及精神病学家相信苏联国内精神病学体系的状况有所好转。然而科里亚金对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一些正常人由于政治原因仍被关押在精神病院。苏联只不过是散布虚假消息，以掩盖国内仍然存在的“将正常的持不同政见者监禁在精神病医院”的事实^⑧。同时，由于苏联政府并没有公开宣告无罪，那些被释放的人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基本权利^⑨。

1988年《科学》(Science)杂志刊登了科里亚金的文章《走向真正取缔酷刑》(Toward Truly Outlawing Torture)，文中科里亚金以自身经历，描述了在苏联存在的“酷刑”，“苏联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其他形式的酷刑，其中一种代表性方式就是在精神病医院通过药物影响病人的心智”^⑩。1990年科里亚金发表文章《精神病学中的强迫：是福是祸？》(Compulsion in psychiatry: blessing or curse?)^⑪，这篇文章论证了苏联精神病学政治迫害体系的现状及运行方式。

① 为免于落人口实，1983年苏联在面对停止滥用精神病学还是继续从事相关行为而被世界精神病学会开除的选择时，率先自动退出了世界精神病学会。

② 周琪：《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

③ Constance Holden, “Émigrés Express Caution on Soviet Human Rights”, Science, New Series, Vol.235, No.4790 (Feb.13, 1987), pp.738-740.

④ Constance Holden, “Politics and Soviet Psychiatry”, Science, 1988, Feb 5.

⑤ “Dr Anatoly Koryagin”, Bulletin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Vol11, October, 1987.

⑥ Anatoly Koryagin,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Bulletin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Vol12, January, 1988.

⑦ 笔者将英文SPH(Special Psychiatric Hospital)。彼得·雷德韦(Peter Reddaway)对被关在两种精神病医院的病人进行了分类。他认为，在普通精神病医院属于民事拘禁(civil commitment)，而在特殊精神病医院属于刑事拘禁(criminal commitment)。“持不同政见者应该为被关在普通精神病医院而感到庆幸，因为普通精神病医院的一切都要优于特殊精神病医院……被关在特殊精神病医院的病人甚至是被剥夺了犯人应有的权利。”

⑧ Anatoly Koryagin, “World psychiatry: readmitting the Soviet Union”, Lancet, Vol. 2 No. 8605 pp.268-269.

⑨ Constance Holden, “Koryagin Skeptical on Glasnost”, Science, Oct23 1987.

⑩ Anatoly Koryagin, “Toward Truly Outlawing Torture”, Science, New Series, Vol.241, No.4871(Sep.9,1988), p.1277.

⑪ Anatoly Koryagin, “Compulsion in psychiatry: blessing or curse?” Psychiatric Bulletin (1990), 14, 394-399.

科里亚金事件始于1981年2月13日，止于1987年2月19日。六年时间，科里亚金经历了审讯、判刑、服刑、绝食抗议，而他的种种遭遇都得到了西方医学组织及人权组织的关注，同时西方组织也对此采取了相应措施，或呼吁，或抗议。科里亚金事件的发展受苏联政府主导，然而，西方

医学组织、人权组织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最终促成了科里亚金被释放。

1995年，科里亚金回到了俄罗斯，他现今居住在雅罗斯拉夫尔州。

(责任编辑 李淑华)

Koryagin Event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CHEN Ya

Abstract: In the 1980s, Koryagin, a psychiatrist of the Soviet Union, suffered wrongful imprisonment for his exposure of the fact that the Soviet government used a mental therapy to persecute dissidents. After Gorbachev was in power, Koryagin was released under double pressure from home and abroad and then he emigrated to Switzerland. After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Koryagin returned to Russia and settled down in Yaroslavskaya Oblast. Koryagin event invited widespread concerns in the the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brought about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Key words: Koryagin; Soviet Union; psychiatry; dissident